

從當代土耳其政教關係的轉變 探討伊斯蘭政黨的崛起

蔡源林

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副教授

摘要

全球五十餘個以穆斯林為主體的國家或政治實體之中，土耳其為少數建立不以伊斯蘭為國教的世俗主義民主政體，其政權輪替大多能透過和平的民主程序完成，實為穆斯林國家的特例，乃是探討伊斯蘭模式的民主政治最佳個案。本文三節分別探討從鄂圖曼帝國至凱末爾共和革命的歷史、族群與宗教脈絡；二戰之後至 1990 年代為止的政黨政治發展趨勢，特別聚焦於擁護伊斯蘭傳統的政黨崛起的國內與國際因素；以及主要伊斯蘭政黨——「正義與發展黨」，取得執政權迄今朝野雙方的政治攻防，以便說明何以由凱末爾主導建立的激進世俗主義憲政制度，經歷半世紀的政黨政治運作，卻在二千年之後出現伊斯蘭政黨的連續執政。本文結論則透過與其他穆斯林國家的對比，強調土耳其相對穩定的民主憲政運作，實有其獨特的歷史文化與地緣政治因素，包括：歐亞橋梁之地理位置、未曾被西方列強所殖民等先決條件，所以更能採取與本土社經文化條件相適應的政治制度與運作模式。

關鍵詞：鄂圖曼、茉莉花革命、凱末爾、共和人民黨、正義與發展黨、艾爾多安

壹、前言

土耳其是伊斯蘭世界少數不以伊斯蘭為國教的世俗體制國家，也是其中相對穩定的民主政體。雖然，軍人干政的陰影仍未完全排除，且庫德族少數民族問題仍為內政與國家安全最大隱憂，但在全球五十餘個以穆斯林為主體的國家或政治實體之中，土耳其的政權輪替大多能透過和平與民主程序完成，實為特例。大部分的穆斯林國家，要不是維持傳統的世襲君主體制，如阿拉伯半島諸國，要不然就是獨立後便轉為軍事獨裁體制，以非洲的穆斯林國家為多。占少數的穆斯林民主政權，大多建立於脫離殖民統治後，在前宗主國的安排下才採行西方式憲政民主體制，但基於內部各種難以擺平的教派、族群與階級矛盾等問題，獨立建國之後常擺盪在民選文人執政與軍事統治的惡性循環，如巴基斯坦、蘇丹、印尼等國；或者雖有民主選舉之名、但仍難擺脫一黨威權統治，如馬來西亞。

2011 年，由北非的突尼西亞群眾示威而點燃的茉莉花革命，席捲中東與北非的伊斯蘭世界，原本被期待將帶動伊斯蘭世界的民主化潮流。不幸的是，除了革命的發源地突尼西亞從威權轉型為民主政體之外，其他響應改革風潮的穆斯林國家，要不是革命被鎮壓，恢復原本專制體制，如埃及；要不就是不同政治黨派激烈衝突，使政局持續動盪，甚至將國家帶入內戰狀態，如敘利亞。上述歷史經驗常令人心生疑問，究竟伊斯蘭文明是否能與當代民主自由的價值相容。個人認為此種論點，大抵受長期以來對伊斯蘭文明的「東方主義」偏見所影響。其實，伊斯蘭並不必然比其他宗教文明更不能與自由民主價值相容；而土耳其在從未被殖民的狀態下採行民主共和體制，其政權輪替亦維持相對穩定。雖然，2017 年 4 月在現任總統艾爾多安 (Recep Tayyip Erdoğan, 1954-) 的主導下，透過修憲公投將土耳其從雙首長制改為總統制，擴大了自己的權力與任期，招致國際社會批評的聲浪，但這一切過程仍依民主程序進行，艾爾多安於 2018 年大選再度贏得延長任期之後的首次連任，所以迄今土耳其仍是穆斯林國家民主政體的特例，為探討伊斯蘭模式的民主政治之最佳案例，值得吾人深入研究與反思。

貳、國家認同重構的歷史脈絡

一、鄂圖曼帝國的崛起與瓦解

1923年，土耳其的國父凱末爾（Mustafa Kemal Atatürk, 1881-1938）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殘破局勢之下，以民族英雄之姿率軍逐退西方列強對土耳其的軍事佔領，建立共和體制。自此以後，土耳其的國家定位面臨著兩個抉擇的問題，一、土耳其究竟是伊斯蘭國家或世俗國家？二、土耳其應該留在亞洲或加入歐洲？凱末爾在當時的兩個抉擇皆選後者。但若從土耳其的歷史遺產（或包袱）來看，此一抉擇並非必然。凱末爾固然能以軍事強人與民族救星的威勢將國家帶入與其他穆斯林國家相反的道路，但上述兩個問題持續徘徊於接下來近百年的現代土耳其歷史。

土耳其的前身為鄂圖曼帝國（Ottoman Empire, 1299-1922），擁有六百多年光榮歷史，曾為伊斯蘭世界的霸主，鄂圖曼「蘇丹」（Sultan）即為全伊斯蘭世界的共主（除伊朗的什葉派王朝之外），享有「哈里發」（Khalifah）的尊號，其原意為穆罕默德先知的繼承人，自穆聖歸真後，成為遜尼派伊斯蘭最高政教領袖的通用頭銜（Hourani, 1995: 25-29）。土耳其民族源出中亞的游牧民族，東起中國新疆，西至前蘇聯中亞共和國之一的哈薩克斯坦，都是古代土耳其各部族的游牧地，在中國唐宋史書則稱為「突厥」（Barthold, 1968: 1-37, 64-99）。當中世紀伊斯蘭帝國的國勢漸趨衰落之際，哈里發為了鞏固中央政權，掃除地方勢力的叛亂，經常收編當時還是異教徒的土耳其游牧部族的年輕人為奴僕與隨從，先令其歸信伊斯蘭，教以宮廷禮儀，接受軍事訓練，自此成為哈里發所倚重的突厥「戰士」（ghazi）與「傭兵」（mamluk）（Barthold, 1968: 180-268）。當伊斯蘭帝國於十一世紀面對來自歐洲的十字軍，以及十三世紀來自中國的蒙古騎兵兩大異教徒的武力威脅之際，哈里發皆依靠突厥傭兵軍團才能逐退強敵。突厥部族的其中一支為了躲避蒙古西征的戰禍，輾轉流亡於安那托利亞高原，並於十四世紀初建立鄂圖曼帝國的前身奧斯曼公國（principality of Osman），原本僅為群雄割據之安那托利亞高原的諸侯國之一，但在擺脫了十字軍與蒙古人的威脅之

後，國勢逐漸轉強，遂肩負起伊斯蘭文明的中興大業，並於十四世紀後半葉開始向拜占庭帝國所屬的地中海沿岸與巴爾幹半島擴張勢力 (Hodgson, 1974, Vol. 2: 263-68, 386-428)。

1453 年，鄂圖曼第七任君王梅赫美特二世 (Mehmed II, 1451-81) 攻陷東羅馬帝國首都君士坦丁堡 (Constantinople)，改名伊斯坦堡 (Istanbul) 並仍設為首都，國祚綿延超過一千五百年歷史的羅馬帝國正式終結，引發全歐洲的震撼與驚恐，「伊斯蘭威脅」遂成歐洲民族數百年揮之不去的夢魘 (Hodgson, 1974, Vol. 2: 555-64)，直到十九世紀中葉以前，鄂圖曼帝國始終是可與歐洲列強爭霸的唯一亞洲強權。然而，西方世界歷經地理大發現與工業革命等一連串的現代化運動洗禮之後，已非中世紀的封建時代所可比擬，在歐洲列強發動殖民主義向全球擴張之後，首當其衝的便是鄂圖曼帝國。當此危機時刻，鄂圖曼帝國的有識之士遂主張以學習西方文明追求富國強兵之道來救國，其推動西化改革的時間遠早於大清帝國¹。十八世紀初期，艾哈邁德三世 (Ahmed III, 1703-30) 在一連串的戰爭失利與不平等條約簽訂之後，開始引進西方的軍事科技與文化，進行有限度的西化改革，但仍挽救不了大局，十九世紀後遂開始推動更進一步的西化與現代化 (Hourani, 1995: 40-48)。

十九世紀歐洲的民族主義與帝國主義風潮席捲全球，鄂圖曼帝國內部的兩大矛盾逐漸浮上檯面而無法化解，終成帝國瓦解的遠因。首先，其東歐與近東領土有高比例的基督教少數民族，成為歐洲列強入侵的橋頭堡，並隨時準備響應歐洲民族主義的號召，擺脫異教與異族的鄂圖曼統治；其次，阿拉伯半島與北非屬地則以阿拉伯民族為主體，對阿拉伯民族而言，鄂圖曼統治者雖為同教，但屬於異族，其間關係頗類似大清帝國中的滿族與漢族的關係，宗教與文化認同雖同，但卻非同文同種的民族 (Hourani, 1995: 50-66)。當近代的民族主義認同逐漸取代原有的宗教與傳統文化的認

¹ 十九世紀以降，鄂圖曼帝國的歷史命運頗似東亞的大清帝國。歐洲列強透過一連串的軍事、外交與經濟手段，迫使東方兩帝國簽訂諸多不平等條約，接續的是割地、賠款、開放通商與傳教等等，鄂圖曼帝國被譏為「近東病夫」，大清帝國則被譏為「東亞病夫」，兩者的近代史頗多類似。歐洲列強侵略鄂圖曼帝國的歷史，參閱 Hourani (1995: 34-40)。

同之後，帝國統治的合法性終將遭受異教異族與同教異族兩種少數民族的質疑與挑戰。西方列強充分洞悉鄂圖曼內部的兩種矛盾並加以利用，遂使得鄂圖曼所屬的基督教臣民與阿拉伯臣民雙雙走向獨立之路。

希臘獨立戰爭（1821-29）為希臘首先爭取到獨立地位之後，開啓了鄂圖曼所屬東歐領土的天主教與東正教各民教的獨立運動，在英、法、德、奧、俄等歐洲列強輪番出擊之下，鄂圖曼屢戰屢敗，直到 1878 年的「柏林會議」（Congress of Berlin）為止，鄂圖曼失去了所有的歐洲領土，只剩下帝都伊斯坦堡鄰近地區。接下來五十年，則連近東與北非的伊斯蘭文化核心地帶亦不保，包括今日的敘利亞、黎巴嫩與巴勒斯坦等地，有相當高比例的阿拉伯基督徒，也在歐洲列強的干預下逐漸取得半獨立的自治地位（Hodgson, 1974, Vol. 3: 228-48; Hourani, 1995: 54-58, 62-66）。此外，埃及一向為阿拉伯伊斯蘭文明的經濟與文化重鎮，亦為近代阿拉伯民族主義的發源地，在英、法兩國的支持下逐漸走向獨立之路（Hodgson, 1974, Vol. 3: 239-47; Hourani, 1995: 49-54, 59-62, 193-209）。最後，伊斯蘭文明的發源地阿拉伯半島的各部族，一向以麥加與麥地那兩聖地的保護者自居，自認其伊斯蘭信仰比土耳其人更正統，再加上民族主義浪潮的影響，遂與鄂圖曼帝國漸行漸遠（Hourani, 1995: 37-38, 269-70, 284-91）。

值此危急存亡之秋，鄂圖曼帝國末期出現了兩種國家認同重構的路線，一為主張回歸傳統的「泛伊斯蘭主義」（Pan-Islamism），企圖喚起所有受西方列強侵略的穆斯林民族團結在伊斯蘭旗幟之下，重振中世紀伊斯蘭文明的盛世，此舉或可挽回同教異族的阿拉伯穆斯林繼續效忠鄂圖曼帝國，但卻使得阿拉伯基督徒更加疏離；第二種認同重構路線為更徹底的西化，走向全新的世俗民族國家之路，揚棄伊斯蘭傳統，改推動「泛土耳其主義」（Pan-Turkism），號召中亞各突厥民族在鄂圖曼領導下共同抵抗歐洲列強，此種主張多少隱含了原鄂圖曼帝國的阿拉伯屬民將不被包含在此一新興土耳其民族之內（Hodgson, 1974, Vol. 3: 250-59; Hourani, 1995: 103-29, 280-88; Landau, 1994: 9-142）。

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18）爆發，英、法兩國暗中策動阿拉伯人反叛鄂圖曼的統治，並允諾前者在戰後取得獨立地位；英國甚且在國際猶太錫

安主義運動領袖的遊說之下，答應讓猶太人戰後返回巴勒斯坦建國，也埋下日後中東亂局的種子，猶太人、阿拉伯基督徒、阿拉伯穆斯林之間如何分割領土主權，至今仍為無解的國際難題。鄂圖曼因與戰敗的德、奧匈兩國為同一陣線，對抗英、法、義、俄等國，導致投降後被英、法為首的聯軍所佔領，在戰後以民族自決為原則的國際秩序重建過程中，六百多年國祚的鄂圖曼帝國終於解體。不但所屬阿拉伯民族為主體的領土紛紛走向獨立，並分別納入英、法兩國的保護，扶植在地政權走向自治與建國；巴勒斯坦則由英國暫時託管，歐洲各國的猶太人開始移民屯墾，準備恢復猶太祖國，使得世居三教聖地的阿拉伯人前途更加黯淡，新一波的民族衝突取代了鄂圖曼統治下耶路撒冷聖地三教和平共存的千年傳統（Hodgson, 1974, Vol. 3: 259-62, 276-81, 297-302; Hourani, 1995: 286-98）。

二、凱末爾革命與邁向世俗民主共和體制

正值舊帝國瓦解、新共和尚未建立的危急存亡之秋，土耳其民族由一戰英雄凱末爾的領導下突破重圍，邁向新局。凱末爾是鄂圖曼帝國末期進行軍事現代化改革之後，培養出來的新一代軍事奇才。他從中學時期便因嚮往軍旅生活而轉念軍事預備學校，從此開啓其漫長的軍職生涯，在軍官學院完成軍事教育訓練後便投入鄂圖曼帝國創立未久的新軍（Mango, 2000: 35-56）。正像中國滿清末年的局面一樣，基於富國強兵需求所編練的新軍，成為接受西方新理念、孕育改革甚至革命思想的場所，在舊帝國體制瓦解之後的權力真空遂由這批新軍將領所填補，凱末爾便是在此一新、舊交替的時勢下成為土耳其共和國之父²。

² 土耳其與中國從舊體制走向新共和的相似處甚多，但差異處也很明顯，兩國的「國父」在建立共和體制所扮演的角色，因有無掌握軍事實權而截然不同。被尊為中華民國國父的孫中山為文人，註定只能成為新、舊政權交接時期的過渡元首，因無軍事實力，共和建立之後的大權便落入新軍將領之手，即袁世凱與北洋軍閥等人；相較之下，土耳其從帝制走向共和體制的過渡期，正是鄂圖曼帝國投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之際，凱末爾便在國家面臨西方列強威脅之際掌握軍權，有效抵抗外敵、鞏固領導中心，並以軍事強人之勢促成國家民族的統一與共和體制的確立，又能身體力行掃除舊勢力來推動現代化改革，土耳其便能在最短的時間邁向現代民族國家體制。凱末爾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事蹟，參閱 Mango（2000: 140-82）。

1919年，國際和平重建啟動，但卻是土耳其另一波危機的開始。英、法兩國分別支持希臘與亞美尼亞兩國自土耳其本部獲取更多領土，希、亞兩國軍隊分別從東、西兩翼進攻，企圖夾擊由凱末爾與各地部將在安那托利亞高原中心安卡拉（Ankara）所組成的臨時政府，於是開啓了長達三年的土耳其獨立戰爭（1919-22）。凱末爾先應付東線的敵軍，1920年在土耳其的東南邊區擊潰法國與亞美尼亞聯軍，但也引發上萬名亞美尼亞難民的屠殺，而這些難民為1915年一次大戰爆發後，鄂圖曼帝國發動震驚世界的亞美尼亞大屠殺之後流亡的難民，該次近乎滅種大屠殺的死亡人數估計有一百五十萬人。在新共和成立之後，雙方為了各自獨立與領土主權完整，又多添了另一次悲劇，導致土耳其與亞美尼亞之間的冷凍關係至今仍無法化解。在稍做喘息之後，凱末爾接著對付西線的希臘軍隊。1921年秋，希臘軍隊已挺進到接近安卡拉西面八十公里處，凱末爾親任主帥迎擊，開始轉守為攻，並在一年內驅逐了土耳其本部內的所有希臘敵軍，於1922年宣布新共和成立，正式讓鄂圖曼帝國走入歷史。1923年的『洛桑條約』（*Treaty of Lausanne*）簽訂後，國際社會正式承認安卡拉為首都的土耳其共和國之合法地位，希、土雙方並達成交換移民的協議，共有土耳其境內的一百一十萬希臘人移往希臘，希臘境內則有三十八萬穆斯林移往土耳其，雙方只剩下塞浦路斯島的主權歸屬尚待解決（Mango, 2000: 220-357）。自此以後，土耳其共和國便成為更純粹的土耳其民族與伊斯蘭信仰的主權國家，擺脫了鄂圖曼時期多民族、多元宗教造成的困局，剩下東南邊境的庫德族為唯一的少數民族，但基於同為穆斯林，其問題原本不若希臘人與亞美尼亞人問題那麼棘手。

凱末爾在1923年建立共和之後，除了持續鄂圖曼時代向西方開放與現代化改革路線之外，又採行一連串更激進的去伊斯蘭化政策，企圖將政治經濟與教育文化的改革一併完成，包括正式宣布廢除哈里發制度、廢除伊斯蘭法庭、另頒佈仿效歐陸法系的民、刑法以取代伊斯蘭律法，並以現代西式教育取代傳統伊斯蘭經院教育，而將清真寺、蘇非（Sufi）聖墓及所屬神職人員全部納入宗教事務部管轄，將《古蘭經》朗誦改用土耳其語，打破了長期以來只能用阿拉伯語誦經的神聖傳統，也廢止中世紀以來沿襲之

阿拉伯字母拼寫的土耳其文，改以拉丁字母拼寫。更激進的伊斯蘭改革措施為廢除穆斯林男女的傳統服裝，婦女在公共場所一律不得戴面紗，若欲延續傳統穿著的婦女，只要披上頭巾即可，但凱末爾本人與其妻則以己身為示範，鼓勵土耳其民眾完全著西式服裝 (Mango, 2000: 361-414; Atabaki & Zürcher, 2004: 98-112, 212-22, 238-59; Eligür, 2010: 43-47)。上述全面性的文化與教育世俗化作法，比起政教分離更加引起爭議，不但國內的伊斯蘭傳統勢力極度不滿，認為是對西方列強文化投降的作法，也引發其他阿拉伯國家的譁然。對最早開創伊斯蘭文明的阿拉伯民族而言，這如同是同教的兄弟之邦決裂的宣示，加深了自鄂圖曼帝國時期就已存在的民族與文化認同的矛盾，伊斯蘭世界宗教文化大一統宣告終結，接下來進入民族政權林立的分裂時期，也埋下了日後伊斯蘭復興運動的伏筆。

1925 年在一系列的去伊斯蘭化改革實施後，庫德族的蘇非長老首先發難，率眾攻擊地方政府機關，但立刻被凱末爾施鐵腕鎮壓 (Tapper, 1991: 102-20)，此後蘇非道團的草根力量開始轉為低調，暗中勾結國會議員與政府官僚體系內部的保守政治菁英，以和平方式來挑戰世俗化政策 (Tapper, 1991: 121-42)，也使凱末爾所扶持的「共和人民黨」(Republican People's Party, *Cumhuriyet Halk Partisi*, CHP) 世俗派與保守派之爭浮上檯面，堅持維護伊斯蘭立國的保守派企圖另立政黨，但凱末爾堅定世俗主義路線為土耳其成為現代化國家的必要前提，另組伊斯蘭政黨被視為違憲，故凱末爾在世期間，雖有議會民主制度，卻仍維持「共和人民黨」一黨獨大的半民主局面 (Atabaki & Zürcher, 2004: 98-112; Eligür, 2010: 48)。

凱末爾在兩次大戰之間所從事的一連串西化改革措施，乃是承接鄂圖曼帝國末期的現代化改革，再跨出最後、最關鍵性的一步。1938 年凱末爾去世之前，因其軍事強人與民族英雄的威望無人能敵，也暫時壓制了傳統保守勢力的反撲，故從表面上看土耳其徹底脫亞入歐、從伊斯蘭國轉為世俗國，世襲帝制改為民主共和似乎也無可逆轉，但其實國家認同的問題並未真正解決。

三、後凱末爾時代的國家認同問題

以伊斯蘭立國的鄂圖曼帝國轉型為世俗主義的土耳其共和國，其實從專制到民主的政體轉變之認同比較不是問題。鄂圖曼帝國末期，哈里發便在立憲派的協助下推動君主立憲制，故民選議會及內閣政府已有雛形，土耳其民眾不會想走回哈里發專制的老路，更大的問題在於國家的伊斯蘭象徵被拿掉，伊斯蘭傳統文化不再指導國家的法律、教育、倫理價值、生活方式，對西化影響不深的廣大鄉村民眾難以理解，而民族主義情感較強烈的知識份子也無法接受為何取得政治獨立之後，還要向西方文化靠攏，豈不是又變成另一種殖民方式？所以，伊斯蘭國與世俗國的認同問題，在凱末爾強人統治結束後再度浮上檯面，再加上土耳其特殊的歐亞橋樑地理位置，使其在對外關係上也形成脫亞入歐或回歸亞洲兩種國家定位抉擇。

二次大戰期間，由同為一戰與獨立戰爭英雄、聲望與地位僅次於凱末爾的伊諾紐（İsmet İnönü, 1884-1973）將軍繼任總統之位。基於一戰成為戰敗國的慘痛歷史教訓，伊諾紐決定在二戰爆發初期保持中立，直到歐戰結束前夕才加入英、美、蘇等同盟國一方，遂使得土耳其成為聯合國創始會員國之一，此後更加速與西方國家合作，並持續凱末爾所奠下基礎的現代化及脫亞入歐的步伐（Atabaki & Zürcher, 2004: 113-29）。1950年代冷戰局勢確立之後，基於地緣政治的考量，土耳其選擇加入美國與西歐的民主陣營一方。因土耳其領土橫跨歐、亞兩洲，扼制俄國從黑海進入地中海的博斯普魯斯（Bosporus）與達達尼爾（Dardanelles）兩海峽的門戶，所以從帝俄時代起就與俄羅斯民族存在著緊張關係。蘇聯共產勢力的擴張，土耳其也是首當其衝，美國亦深知土耳其為防堵共產勢力南下取得制海權最重要的反共前線，此種局勢幾乎使土耳其與美國、西歐國家一拍即合，土耳其不但支持馬歇爾計劃重建歐洲、派兵支援韓戰美軍的一方，也在1952年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1961年又加入「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而為創始會員國，其脫亞入歐的過程因冷戰情勢而加速進行，土耳其幾乎成為西方自由民主陣營在亞洲最忠實的盟友（Kösebalaban, 2011: 69-85; Ercan, 2017: 42-53）。

整體而言，土耳其的國家認同問題，主要來自於其所承接的鄂圖曼帝國的伊斯蘭傳統要如何與現代化國家制度與政策取得平衡，這也是一般具有深厚伊斯蘭傳統的國家普遍存在的問題，而為其他非穆斯林國家較難以理解之處。西方現代文明首開政教分離與世俗化的風氣之先，並透過殖民政治與文化霸權向全球推展，但非西方國家的接受程度則有相當落差。東亞國家在短暫的文化轉型陣痛之後，也都紛紛切斷傳統文化與政治制度的關係，全力朝向西方式的民族國家建構而努力，故中、日、韓三國各自以民主或集權的方式，朝同樣的現代化目標前進，傳統文化遂位居邊緣角色。但伊斯蘭世界的歷史經驗有所不同，當鄂圖曼帝國與西方列強相互抗衡的時代，正是打著伊斯蘭聖戰旗號的光榮時期，國家的衰落與伊斯蘭傳統似乎沒有直接關係，而對伊斯蘭認同強烈者，反而認為是因為伊斯蘭信仰薄弱後才造成無法抵抗西方的侵略，應該加強精神文化來指揮物質文化的運用，而不是放棄自己的傳統去附和西方文化。像凱末爾這樣視伊斯蘭為現代化改革障礙者，在當時的伊斯蘭世界為極少數，此種激進西化派的擁護者，大多為最早接受西方教育的都市菁英。更何況凱末爾本人只是反對政教分離，他在私領域生活仍維持虔誠的穆斯林身分，其激進改革所欲掃除者為維護既得利益的傳統菁英階層，故只是切斷舊伊斯蘭體制與政府官僚及教育體系的關係，而非建立一個無神論的國家。

雖然，土耳其官方沒有提供精確的宗教別與族群別人口統計數字，但各方專家估計穆斯林佔全國總人口數超過 95%，其中約七成為遜尼派，約三成為什葉派各分支，官方所承認的非穆斯林宗教少數族群只有亞美尼亞人 (70,000)、猶太人 (26,000) 與希臘人 (5,000)，但三者的總數還佔不到 1% (Joshua Project, 2015)，所以獨立後的土耳其，已不再有鄂圖曼時期的多元宗教之間如何和平共存的難題，故對伊斯蘭認同強烈者認為沒有理由走世俗化路線。此外，土耳其的族群問題只剩庫德族較難處理，粗估土耳其族佔總人口的 70%-75%，庫德族為最大少數民族，約 13%-23%，且相當集中於東南與敘利亞、伊拉克交界的邊陲地區，與兩鄰國的庫德族區域相連，其獨立運動自 1980 年代轉趨激進之後，至今仍無法完全平息。但庫德族為同教異族，與大部分土耳其人一樣都是遜尼派，所以對保守派而言，

宗教不但不是分裂之源，反而是整合庫德族可用的文化資源。其他的宗教少數族群大約 7%-12%，包括猶太教徒、東正教徒與什葉派，但人口極分散，對政治整合並未造成問題（Çağaptay, 2006: 11-40, 102-13）。總之，當前土耳其的宗教問題，主要是在一個超過 95% 的穆斯林人口，卻由世俗派菁英強勢地實行世俗化政策而衍生出來的。

參、土耳其世俗民主政體的實驗

一、世俗左派與右派兩黨競爭時期（1946-71）

1946 年，土耳其正式結束由一黨獨大的半民主體制，揮別了凱末爾軍事強人的過渡時期，和平走向西方式議會民主政體。不過，土耳其立國初期的國家認同問題不但沒有消除，反而藉由多黨競爭的民主機制而有更具對立性的政治展現，世俗派與保守派的對峙成爲探索二次戰後土耳其政治發展的主軸，而雙方勢力的消長，與國內與國際局勢變化都有密切關係。凱末爾在世時，以其個人的威望，透過一黨獨大的國民議會，強勢主導世俗憲法的推動，黨內外的反對勢力很快被鎮壓，所以去伊斯蘭政策表面上執行的相當徹底，但問題只是暫時被強人的光環所掩蓋，伊斯蘭傳統勢力已歷數百年鄂圖曼統治而根深蒂固，並未被消解，甚至蓄勢待發地尋找出路，也使得右翼政黨得以訴求伊斯蘭取得宗教勢力的支持，持續挑戰「共和人民黨」所延續的凱末爾主義路線。

由凱末爾所創立的「共和人民黨」，從 1923 年建國至 1946 年爲止，爲土耳其國內唯一合法政黨，其政治綱領爲中間偏左路線，支持議會民主制度，但在經濟上則主張透過中央集權的計畫經濟來促進工業化及所得重分配，教育文化上則採行反傳統主義、土耳其主義與西化路線（Atabaki & Zürcher, 2004: 98-112）。上述政策的有效執行，有賴強勢領導與有效率的行政官僚。但凱末爾過世後，「共和人民黨」已無國父的光環加持，黨內不再有可承接凱末爾未盡之務的強勢領袖，但卻仍一味地堅持凱末爾激進的去伊斯蘭化與大幅現代化路線，導致以鄉村地區的傳統勢力反撲，而代表該

勢力的黨內領袖便出走另組中間偏右的「民主黨」(Democratic Party, *Demokrat Parti*, DP)，其政綱更強調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更多的地方分權，也更傾向回歸伊斯蘭傳統 (Eligür, 2010: 49-51)。

1950 年舉行開放多黨競爭的第一次全國大選，「民主黨」竟獲得過半數的 55% 得票率，囊括議會 415 席次，一舉拿下執政權，「共和人民黨」淪為最大在野黨，雖獲得 40% 的得票率，但僅有 69 席的議員，可謂慘敗。「共和人民黨」得票數與其席次不成比例，與當時土耳其所實施的複數大選區連記法的選舉制度有關，該制易導致每一選區的第一大黨可以囊括該選區所有議席 (Wikipedia, 2021a)。「共和人民黨」佔優勢的選區，只集中於西化與現代化程度最深的西部沿海大城；而「民主黨」佔優勢的選區則為傳統文化較深厚的整個內陸與東部的農業地區。其時土耳其尚未工業化與都市化，「共和人民黨」激進的世俗化與現代化政策，在一個仍有 80% 農業人口及傳統文化深厚的穆斯林國家，顯然不得民心，且又缺乏強人的背書，很難不會因碰觸文化認同底線而遭致反彈。接下來的 1954、1957 兩屆大選，「民主黨」仍穩坐執政黨大位，直到 1960 年第一次軍事政變爆發，才結束「民主黨」的十年執政 (Eligür, 2010: 51-52)。

冷戰時代的前期，大約從 1950 年代至 1970 年代初期，土耳其和大部分穆斯林國家一樣，基於才剛擺脫西方殖民主義取得獨立自主地位，維護國家主權領土完整並滿足民生經濟基本需求為立國要務，故伊斯蘭議題尚未成為政治鬥爭的主要焦點。因此，激進的反傳統主義，固然不得民心，但太過強調以伊斯蘭立國，也不一定有太多政治利益，因文化認同建構並非燃眉之急。當時甚至連阿拉伯國家也都以富國強兵為第一要務，所以採行伊斯蘭綱領的政黨並未出現在那些幾乎清一色為穆斯林的中東國家，反而是在南亞與東南亞等伊斯蘭世界的邊緣國家，因國內有較大非伊斯蘭的宗教群體（如馬來西亞），或者面對非穆斯林鄰國的威脅（如巴基斯坦），基於鞏固內部團結、創造與敵對政營的政治區隔作用，才出現以伊斯蘭為黨名或綱領的政黨。當時，比土耳其有更悠久伊斯蘭文明的穆斯林國家，在推翻舊有世襲君王以後，取而代之的大多為傾向世俗主義的軍人威權體制，如埃及、敘利亞、伊拉克，甚至連舊王室復辟的伊朗，為了剷除傳統

勢力並鞏固個人權威，也藉由實施不同程度的政教分離，將神職人員的權力限縮在宗教事務上，但上述國家一直停留在威權統治，並未因採世俗化政策就轉型為民主體制。此外，維持伊斯蘭立國傳統的世襲蘇丹制度，主要集中於阿拉伯半島諸國，這些國家採取更保守的政治路線，既無世俗化，也無民主化。所以，冷戰時期的中東國家，只有從未有殖民統治經驗的土耳其，才採世俗化與民主化雙管齊下的大膽政治路線，其他嘗試採行多黨競爭的議會民主體制的國家，以伊斯蘭文明較外緣國家為主，如巴基斯坦、蘇丹、印尼與馬來西亞。但這些國家歷經幾任的文人民選政府的實驗失敗之後，最後也紛紛步上軍人高壓統治或一黨專政的後塵³。

比起其他穆斯林國家的獨裁者，凱末爾對世俗民主體制有更理想性的堅持，在世俗政權運作穩固以後，凱末爾也逐漸退居幕後，所以自共和成立以降，每四年都定期舉辦國會選舉，使民主運作步入常態，並未濫用軍方權力來干預政局。凱末爾所領導的「共和人民黨」主導下制定的土耳其憲法，除明訂政教分離原則外，並採用民選一院制議會、三權分力、行政權為總統與總理雙首長制、司法獨立等現代民主國家的基本體制，並賦予憲法法院有權對違反世俗原則的政黨剝奪其合法參政權，更嚴重者將被解散，不得參與公共事務，做為確保世俗體制的最後安全瓣（Saleem, 2017: 35-44; Eligür, 2010: 41-47）。因此直到 1970 年為主，歷次國會大選雖有努力爭取隱性的伊斯蘭選民之右翼政黨，但並無任何明確標榜伊斯蘭政綱的政黨可以合法存在。

「民主黨」可以在後凱末爾時代連續三次贏得大選，取得二次戰後初期十年的執政權，主要因素便是能迎合鄉村地區民眾的傳統文化認同，扭轉凱末爾時期激進的世俗化政策，包括公立學校恢復強制性的伊斯蘭教育、恢復國家廣播電台的古蘭經朗誦節目、一天五次禮拜的誦經回歸以阿拉伯文朗誦，並對清真寺與蘇非道團違法私設的古蘭經課程不予取締（Jenkins, 2008: 114-24; Rabasa & Stephen, 2008: 35-37; Eligür, 2010: 57）。

³ 有關穆斯林國家二戰以後的政治發展與民主化過程的宏觀比較分析，參閱 Noi (2013)、Teik 等人 (2014)、及 Esposito 等人 (2016)。

相當諷刺的是，以民主選舉贏得政權的「民主黨」，其實只想賦予傳統文化的再現更大的自由，但卻修法限制出版與言論自由，企圖壓制異議分子的批判與親「共和人民黨」的言論；「民主黨」也深知軍隊及文官體系為「共和人民黨」的中堅力量，竟修法要求軍人與公務員提早退休，企圖重組國家機器為己所用，形成「民主黨」不民主，導致軍方以不民主的方式恢復民主政治的怪現象。1960 年，軍方發動實施多黨民主制度以來的第一次政變，迫使「民主黨」政府下台，並將總理與數位內閣閣員逮捕並判刑，將原訂的 1960 年大選延至隔年舉行，終結失敗的十年民主實驗，幸好更大規模的整肅並未發生，「民主黨」解散之後又改組為「正義黨」(Justice Party, *Adalet Partisi*, AP)，繼續維繫其中間偏右的政治路線，與「共和人民黨」的中間偏左路線再度在 1961 年大選對決，這是伊斯蘭政黨崛起前，土耳其政壇上的兩個主要政治選項 (Rabasa & Stephen, 2008: 36; Eligür, 2010: 58-59)。接下來的三十年，土耳其又重演了每十年一回的民主與軍事政變的三次輪替循環。

1960 年的軍事政變推動了 1961 年的修憲，為讓世俗派與保守派均能滿意，憲法更明確訂定保障宗教信仰自由與言論出版自由，但也更加嚴格限制宗教團體不得干預政治與公共事務，並設置專門的憲法法院，對立法與行政部門的違憲法律與行政措施享有司法審查權，並提升國家安全會議的行政層級，使其直屬於總理的指揮 (Eligür, 2010: 59-60)。上述修憲以制度貫徹凱末爾主義，「共和人民黨」透過軍隊與司法權力來捍衛世俗體制的意圖極為明顯。修憲後便立即恢復國會選舉，「共和人民黨」雖再度贏回第一大黨的地位，但因未達國會席次半數，不得不與其他政黨共組聯合政府，並採取部分「民主黨」以國家資源補助宗教事務的作法，在無法貫徹世俗化政策之後，決定調整策略，以建構一種現代版的伊斯蘭意識形態，強調伊斯蘭進步、理性與開明的特質，使土耳其伊斯蘭文化與阿拉伯伊斯蘭文化做切割，並開辦結合現代知識課程於傳統經學教育的神職人員養成學校，意圖培養新一代符合現代潮流的神職人員，取代極力抗拒世俗化政策的保守反動之清真寺教長與蘇非長老 (Jenkins, 2008: 124-31; Eligür, 2010: 60-61)。1961 年的憲政改革的結果，其實造成了兩個相互矛盾的結果，一

方面帶來了更多元與自由的政治文化，但同時也強化了伊斯蘭勢力取得更大的公共發言權，開啓了接下來數十年的伊斯蘭式自由化與民主化過程。當然，1970年伊斯蘭政黨的崛起與壯大，不單只是土耳其國內局勢轉趨自由化有關，也與國際局勢的變化有所牽連。

二、伊斯蘭政治勢力的崛起

冷戰時代，許多第三世界國家面對當時存在的美、蘇兩大強權的對抗所形成的非左即右的兩種政治選項都感到無奈，也都企圖在西方國家所提供的兩條路線之外，發展出具有民族主體性與適合本土社會的第三條政治路線，從回歸傳統文化找尋意識型態基礎，常為政治傾向保守的右派勢力所選擇的模式，像土耳其這種具有悠久歷史文化及光榮過去的國家，更容易形成訴求傳統價值的右傾政治勢力，且身處於自由民主陣營，以回歸傳統來反制共產主義亦為政治上可容許的選項。事實上，美國在冷戰的圍堵策略下，支持第三世界的各種反共右翼勢力來抵制共產紅潮的蔓延，例如在中東地區，拉攏伊斯蘭勢力來反共實有跡可尋⁴。當然，這並非指稱中東國家的伊斯蘭勢力都由美國所扶持，更保留的說法是在當時兩大超強對抗的局勢之下，訴求反共的本土宗教力量可能成為西方民主陣營的潛在盟友。美國政府或許也無法預期到冷戰時期所支持的伊斯蘭盟友，在後冷戰時代會轉變成區域安全的主要威脅，而衍生出今日的反恐戰爭。

不過，伊斯蘭政治力量的大爆發而逐步超越冷戰的格局，則以1979年的伊朗什葉派革命起而推翻親美的巴勒維政權，最具指標性意義。當今學者在探索伊斯蘭復興風潮的肇始，1979年常被認為是主要的歷史分水嶺（Esposito, 2005: 158-200; Teik, et al., 2014: 66-88, 201-23）。當前吾人最熟悉的兩種伊斯蘭激進政治模式都出現在這一年，伊朗以大規模的群眾運動迫使世俗化的獨裁政權垮台；同一年，阿富汗聖戰士以武裝游擊戰對抗親蘇聯的社會主義政權，穆斯林分別以兩種激進方案對抗由美、蘇兩超強背書

⁴ 冷戰時期，土耳其以反共與結盟西方世界為主軸的外交政策，參閱 Kösebalaban (2011: 69-115)。

的本土世俗政權，對其他穆斯林國家起著非常大的激勵與仿效作用。與此相對照，以和平漸進的議會民主路線企圖獲取政權的伊斯蘭政黨，如埃及的「穆斯林兄弟會」與巴基斯坦的「伊斯蘭協會」，卻反而徒勞無功，前者遭受軍人獨裁政府的無情打壓，後者則始終都不能成為巴基斯坦的主流政黨，但在 1979 年以前，土耳其伊斯蘭政黨的命運似乎介於兩者之間。

1960 年代，伊斯蘭復興運動開始以社會運動的形式在各穆斯林國家蔓延開來時，土耳其的右派政黨也開始吸收伊斯蘭的養分。雖然礙於世俗憲法的規範，土耳其各政黨均不可能明目張膽打著伊斯蘭旗號參與政治，但受國際伊斯蘭思潮啟發的新一代知識份子，已逐步參與政治光譜接近的右翼政黨。當 1965、1969 年兩次大選，中間偏右的「正義黨」取得執政權後，開始與擁有廣大信眾的兩大蘇非道團，「努爾庫斯」(Nurcus) 與「納合西班牙迪」(Nakshibendis)，組成祕密的選舉結盟，兩大道團以選票將「正義黨」領袖推上執政大位，並換取「正義黨」將蘇非道團成員安排進入政府官僚體制，以推動伊斯蘭化的公共政策 (Silverstein, 2011: 97-132; Bruce, 2019: 23-28)。右翼政黨企圖吸收伊斯蘭選票所導致的長期效應，其實是使右翼勢力逐漸被伊斯蘭化。1970 年，右派的兩股政治勢力，反共立場鮮明的土耳其民族主義者與伊斯蘭主義者合流，組成土耳其第一個以伊斯蘭為改革綱領的政黨，「國民建制黨」(National Order Party, *Millî Nizam Partisi*, MNP)，並推選因不滿「正義黨」政策而出走的國會議員與商業部長艾巴肯 (Necmettin Erbakan, 1926-2011) 為黨主席，兩大蘇非道團便轉而支持更契合其傳統理念的「國民建制黨」(Jenkins, 2008: 131-38; Eligür, 2010: 66-67)。

世俗右翼與伊斯蘭右翼政治勢力的聯合，實因對土耳其的極左勢力逐漸壯大並採取激進手段企圖奪權有關。在冷戰時期，自由民主國家的恐共氛圍容易滋長極右派勢力的集結，極左與極右勢力的激烈對抗，使得 1960 年代的土耳其政壇極不穩定，而「正義黨」無力處理政治兩極化所帶來的動盪不安，為 1971 年的第二次軍事政變吹響號角。政變之後，「正義黨」與其前身「民主黨」遭受同樣的厄運，其政府被迫解散。表面上，憲法法院以各打五十大板的公平方式來處理左派與右派兩大政黨，前者為 1961 年

成立的「勞工黨」(Labour Party, *Emek Partisi*, EMEP)，後者為剛成立一年的「國民建制黨」，也迫使艾巴肯流亡瑞士。但在後續的審判過程，幾乎只針對「勞工黨」的領導階層，卻放過「國民建制黨」，使其在 1972 年幾乎是以換湯不換藥的模式，改組為「國民拯救黨」(National Salvation Party, *Millî Selâmet Partisi*, MSP)，而軍方高層也私下坦承因更恐懼共產黨在土耳其的坐大，伊斯蘭政黨不失為制衡的力量 (Rabasa & Stephen, 2008: 37-38; Eligür, 2010: 67-68)。

三、多黨競爭時期 (1972-95) 伊斯蘭政黨的發展

「國民拯救黨」的政治主張採取了國際伊斯蘭運動常見的論調，認為伊斯蘭既反對資本主義，亦反對社會主義，兩者都是西方文明唯物論的意識形態，缺乏道德基礎。伊斯蘭應領導人類文明走出第三條道路，重建精神文明來領導物質文明的進步。艾巴肯並譴責土耳其加入歐洲共同市場的作法，乃是「新十字軍心態的產物」(Eligür, 2010: 69)。艾巴肯所領黨的「國民拯救黨」，在政治公領域上採取低調作法，以避免再被執政當局找麻煩，但私底下卻大力擴展組織，不但在全國各省與縣市均設立地方支部，並將組織網絡延伸到海外，特別是歐洲各國的土裔僑民，以獲得更多經費挹注。1973 年的國會大選，改頭換面的「國民拯救黨」贏得 11.8% 的選票，取得 48 席國會議員，已成為土耳其第三大政黨 (Eligür, 2010: 70)，僅次於「共和人民黨」與「正義黨」兩大主流政黨，前者並邀請「國民拯救黨」共組聯合政府，艾巴肯升任副總理，「國民拯救黨」其他領袖亦分到幾個內閣部會首長職位。但此一左、右共治的聯合政府在一年後破局，改由右翼的「正義黨」邀請「國民拯救黨」組民族主義陣線聯合政府，伊斯蘭政黨竟然左右逢源，使其同時具備在朝與在野兩方的實力。雖然 1977 年大選，「國民拯救黨」的席次掉了一半，但仍被執政的「正義黨」邀請加入第二次的民族主義陣線聯合政府 (Eligür, 2010: 71)。但由於主導政局的兩大黨均無法改善衰退的經濟，也無力應付逐步升高的政治暴力，1980 年軍方第三度發動政變，並持續長達三年的軍事統治 (Eligür, 2010: 88-105; Jenkins, 2008: 141-45)。

這次政變之後，軍政府採取更徹底的政治重組。首先宣布所有政黨均為非法組織，並認為土耳其政局紊亂乃因多黨林立的結果，故決定修訂選舉法，1983 年正式實施新制，設立政黨獲得 10% 以上選票才有席次的高門檻，企圖讓土耳其變成兩黨或三黨制。新選舉法通過後，隨即舉行大選，軍政府只允許三個世俗政黨參與選舉，經過政治勢力的重新洗牌之後，左派勢力等於被徹底邊緣化，中間偏右的「祖國黨」(Motherland Party, *Anavatan Partisi*, ANAP) 囊括了 45.1% 的選票及國會 211 個席次，取得執政權。同年，「國民拯救黨」改組為「福利黨」(Welfare Party, *Refah Partisi*, RP)，但卻無法參與大選，只能暗中發展組織，壯大基層實力，其潛在選民在大選時只好支持理念較接近的「祖國黨」。雖然，1987 年執政黨以公投決定廢除政黨參選的限制，土耳其再度恢復多黨林立的狀況，但同年所舉行的國會大選，「福利黨」初次參選的表現不佳，但開始進行更務實的深根基層策略，努力經營取得執政權的地方治理，以地方包圍中央，逐步邁向 1990 年代成為第一大黨的地位 (Eligür, 2010: 76-78; Rabasa & Stephen, 2008: 38-40; Jenkins, 2008: 146-53)。

何以在 1980 年代受世俗體制壓抑而無法參與全國選舉的「福利黨」，能在沉寂近十年後迅速崛起？主要原因在於軍政府主導的 1983 年政黨重組後，主要政治選項偏向由世俗右翼集團主導，使得左翼政治傾向的民眾沒有滿意的政黨可供選擇，左派選民在失望之餘，逐漸流向伊斯蘭政黨。「福利黨」比起先前的伊斯蘭政黨，政治路線採取更包容與更實用主義的方案，而不再像過去只是打著回歸傳統的口號，或以空泛的理想來引發民眾的熱情，並無法展現治國與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福利黨」雖然在政治與教育文化上仍維持右翼主張，但在經濟上卻往左傾，特別重視都市中下階層與鄉村民眾在經濟發展過程所造成的分配不均與社會不公的困境，提出兼顧發展與分配正義的經濟改革方案，並在地方執政中落實，逐漸成為左翼選民的最佳選擇。1980 年代，西方國家新自由主義的抬頭，也影響了第三世界國家統治者的效尤，但這種右派經濟路線引發的是跨國資本掠奪第三世界國家、貧富不均現象的全球化，對此種不公現象的抗議與反制，在穆斯林國家中，經常集結於各種伊斯蘭運動的旗幟之下，其他選項的政治基礎

已幾乎被掏空。隨著全球化時代來臨，特定國家的伊斯蘭改革或革命運動也會更迅速地透過國際聯結傳遍伊斯蘭世界，基於共同的苦難經驗，開創出共同的救贖之道。

1979年，伊朗首次建立第一個現代共和體制與神權結合的伊斯蘭政體，雖立刻陷入兩伊戰爭的泥淖，使其得以向世人顯示何謂神權式民主政體的時間延緩了十多年。但伊朗的伊斯蘭革命成功，對其他國家的伊斯蘭政黨如同打了一劑強心針，土耳其便是最好的例證。1990年以後，土耳其的伊斯蘭政黨的聲勢水漲船高，軍事政變之後改組的「福利黨」開始發展深根基層的外圍群眾組織，並在海外土裔僑民之間建立海外支部，在左、右兩翼的主要世俗政黨均無法解決逐漸惡化的經濟資源分配與城鄉差距的問題之後，再加上土耳其積極爭取加入歐盟，但屢屢遭到質疑與刁難之際，「福利黨」以正義、福利與靈性復興來包裝伊斯蘭政治綱領，逐漸贏得鄉村與都市中下階層民眾的支持（Eligür, 2010: 78-84, 136-81; Rabasa & Stephen, 2008: 40-44; Jenkins, 2008: 153-60）。歷經十年的重整旗鼓，伊斯蘭政黨的未來政治明星、現任總統艾爾多安在此因緣際會的關鍵時刻，以新生代政治領袖之姿首度進入國會，更在1994年地方選舉時拿下第一大城市伊斯坦堡的市長寶座（Eligür, 2010: 176-79）。隔年的國會大選，「福利黨」首次成為國會第一大黨，但並未過半數，左、右兩邊的世俗政黨基於共同利益採取聯合陣線以抗拒「福利黨」取得政權，但已難阻擋其日益高漲的氣勢了！

表1將伊斯蘭政黨或組織尚為在野勢力時期的四十年期間，歷次大選各主要政黨按照左、右政治光譜歸類，並列出其國會席次與得票率，以便總結上述土耳其政黨政治板塊變動的趨勢。1960年第一次軍事政變的前十年三次大選，土耳其人民僅有中間偏右的「民主黨」與中間偏左的「共和人民黨」可供選擇，而更趨保守的伊斯蘭傾向選民隱藏在前者的支持者中；1961年至1980年第三次軍事政變期間的五次大選，由於更自由化的憲政改革，左、右兩邊的政治光譜皆出現更多元的政黨選項，比中間偏右政黨更為保守與傳統路線的伊斯蘭政黨，逐漸在遵守世俗體制的遊戲規則下以特殊的樣貌嶄露頭角，原本採中間路線的兩大黨開始流失其群眾基礎，但由

表 1：1950-99 大選各主要政黨席次與得票率

大選年代	政黨與政治 路線	中間偏左	中間偏右	正右	其他 政黨與獨 立候選人
		共和人民黨 (1950-83, 1995-) 社會民主民粹黨 (1987-91) 民主左翼黨 (1991-99)	民主黨 (1950-57) 正義黨 (1961-77) 祖國黨 (1983-99) 民族主義民主黨 (1983) 真道黨 (1987-99)	民族拯救黨 (1973-77) 福利黨 (1991-95) 美德黨 (1999) 民族主義運動黨 (1999)	
1950	席次	69	408		10
	得票率	38%	53%		8%
1954	席次	31	503		7
	得票率	35%	58%		7%
1957	席次	178	424		8
	得票率	41%	49%		10%
1961	席次	173	158		119
	得票率	37%	35%		28%
1965	席次	134	240		76
	得票率	29%	53%		18%
1969	席次	143	256		51
	得票率	27%	47%		26%
1973	席次	185	149	48	68
	得票率	33%	30%	12%	25%
1977	席次	213	189	24	24
	得票率	41%	37%	9%	13%
1983	席次	117	211 (祖) / 71 (民)		0
	得票率	31%	45% (祖) / 23% (民)		1%
1987	席次	99	292 (祖) / 59 (真)		0
	得票率	25%	36% (祖) / 19% (真)		20%
1991	席次	88 (社) / 7 (民)	115 (祖) / 178 (真)	62	0
	得票率	21% (社) / 11% (民)	24% (祖) / 27% (真)	17%	1%
1995	席次	49 (共) / 76 (民)	132 (祖) / 135 (真)	158	0
	得票率	11% (共) / 15% (民)	20% (祖) / 19% (真)	21%	14%
1999	席次	0 (共) / 136 (民)	86 (祖) / 85 (真)	111 (美) / 129 (民)	3
	得票率	9% (共) / 22% (民)	13% (祖) / 12% (真)	15% (美) / 18% (民)	11%

資料來源：Wikipedia (2021b)、以及 Eligür (2010)。

於土耳其加入西方國家的反共陣營，所以比「共和人民黨」更左傾的政黨遭受更大的壓制，而比「民主黨」接棒者「正義黨」更往右傾的伊斯蘭政黨，卻因國際的反共情勢與伊斯蘭復興風潮，得以半遮半掩的方式合法參與政黨競爭，逐步取得了右派勢力的主導權。

1980 年軍事政變後的憲政改革，又限縮了政黨政治的多元性，以相當高的 10% 得票率做為分配國會席次的門檻，且更強硬地執行反左與反伊斯蘭的政策，在這套新遊戲規則下又進行了五次大選，伊斯蘭傾向選民再度隱藏在世俗右翼政黨的支持群眾，而伊斯蘭政黨也開始調整路線，深耕基層，終於在 1990 年代更為自由開放、但也更為紛擾的後冷戰初期，躍升為第一大在野黨，甚至在 1995 年大選左、右兩翼的世俗陣營皆面臨分裂之際，伊斯蘭政黨成為獲得最多選票的第一大黨。1999 年大選，竟然演變成中間偏左、中間偏右、正右三大勢力各有兩個主要政黨，任一政黨或甚至任一政治光譜的兩黨聯合皆無法過半的亂局。原本代表中間偏左路線的「共和人民黨」，竟被「民主左翼黨」(Democratic Left Party, *Demokratik Sol Parti*, DSP) 所取代，首次低於 10% 門檻而分不到任何國會席次；而正右伊斯蘭政黨改組的「美德黨」(Virtue Party, *Fazilet Partisi*, FP)，也被採大土耳其民族主義路線的「民族主義運動黨」(Nationalist Movement Party, *Milliyetçi Hareket Partisi*, MHP) 瓜分票源，導致聯合政府一時難產，勉強建立世俗左、右派共治的不穩定政權，而伊斯蘭政黨以第一大在野黨地位蓄勢待發，準備收拾土耳其多黨政治破敗的殘局，邁向下個世紀的執政之路。

肆、伊斯蘭政黨邁向執政之路

一、艾爾多安的崛起與伊斯蘭政黨的重組

現任總統艾爾多安 (Recep Tayyip Erdoğan, 1954-) 為土耳其主要伊斯蘭政黨的領袖，其個人的成長背景與政治崛起的過程，正好和國父凱末爾形成有趣的對比。從激進捍衛世俗化與西化路線的第一任總統，到主張回歸伊斯蘭傳統的現任第十二任總統，其間的差異體現了土耳其立國近百年

的國家發展方向的轉變大勢。

艾爾多安成長於虔誠的穆斯林家庭，從中學以後便進入宗教學校接受傳統伊斯蘭教育的薰陶，大學則念經濟與商學，他也如許多傳統的土耳其穆斯林一樣，加入蘇非道團而為靈修門生，其蘇非傳承屬於土耳其三大支派之一的「納合西班牙底」道團 (Rabasa & Larabee, 2008: 14-15)。艾爾多安的政治啓蒙始於 1970 年代加入反共色彩濃厚的「全國土耳其學生聯盟」(National Turkish Student Union)，1976 年又加入當時主要的伊斯蘭政黨「國民拯救黨」的地方青年支部，稍後被選為主席，接著轉任伊斯坦堡青年支部主席，遂奠定其在全國政壇嶄露頭角的基礎。1980 年第三次軍事政變爆發，「國民拯救黨」再度步其前身「國民建制黨」的後塵，因公然提倡伊斯蘭而被憲法法院裁定違反憲法世俗原則而被迫解散，艾爾多安與「國民拯救黨」的其他堅定支持伊斯蘭信念的黨員再度另組「福利黨」⁵。1985 年，艾爾多安被選為伊斯坦堡市黨部主席，但歷經兩次被解散及第三次改組，伊斯蘭政黨不但沒有受挫而走下坡，其聲望反比 1970 年代大幅提高。

1991 年，艾爾多安首次進軍國會並勝選，但因其伊斯蘭立場而被判當選無效。1994 年地方選舉，經由「福利黨」深根基層的政策奏效，全國 76 個省長職位中「福利黨」拿下 28 席，且其勝選地區已從過去的以鄉村地區為主，擴展到大都會地區，包括伊斯坦堡與安卡拉，其他世俗政黨的得票均大幅滑落，也預告了 1995 年大選，「福利黨」首次贏得第一大黨的地位，伊斯蘭政黨逐漸建立其執政品牌，反轉土耳其以世俗政黨主導的局勢。艾爾多安代表「福利黨」出征第一大城伊斯坦堡並贏得市長寶座，擔任伊斯坦堡市長期間，雖有反對陣營散佈謠言，指控其上台後將恢復嚴苛的伊斯蘭刑法，但艾爾多安以穩健、溫和的手段經營市政，並改善這座千年古城的水源不足、空氣污染與交通壅塞的長年問題，政績斐然，預料將成為政壇的明日之星。但此時世俗勢力故計重施，趁 1997 年底艾爾多安公開朗誦

⁵ 艾爾多安的早年經歷與 1994 年擔任伊斯坦堡市長以前的政治活動，參閱 Silverstein (2011: 16-18, 103-107)、Eligür (2010: 161-62)、Rabasa 與 Larabee (2008: 45-47)、Bruce (2019: 31-32)、Jenkins (2008: 165-66)。

一篇歌頌伊斯蘭情操的詩篇後，指控其違反政教分離原則，公開煽動群眾的宗教狂熱，1998 年不但艾爾多安被免除市長職位，判刑十個月，且憲法法庭宣布「福利黨」違反憲法的世俗原則，第三次被迫解散改組（Jenkins, 2008: 166-67; Eligür, 2010: 176178）。

2001 年，伊斯蘭在野勢力經過第四次的改組，以「正義與發展黨」（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 *Adalet ve Kalkınma Partisi*, AKP）之名再度投入政黨競爭，艾爾多安反而因遭受政治迫害而更聲名大噪，成為無可挑戰的新黨魁，率領該黨於 2002 年大選贏得壓倒性的國會三分之二的絕對多數席次，得票數則僅為 34%，此乃因多黨林立而致分割選票的結果。伊斯蘭政黨首次取得執政權，但此時艾爾多安仍處於褫奪公權的狀態，故並未參與國會選舉，新政府先由古爾（Abdullah Gül, 1950-）出面接總理一職，然後再通過恢復艾爾多安的參政權並參與一席國會補選後，2003 年接任總理。在艾爾多安的領導之下，「正義與發展黨」繼續贏得 2007、2011 兩次大選，他也穩坐總理職位長達 11 年（2003-14），且總得票數節節升高，分別為 2007 年的 47% 及 2011 年的 50%，已達到半數選民的支持，這在多黨林立的土耳其政治生態下是相當困難的任務（Eligür, 2010: 242-48, 254-61; Keyman & Gumüşcu, 2014: 34-43; Rabasa & Larabee, 2008: 44-50）。

二、「正義與發展黨」獨大時期（2002-）

艾爾多安所領導的「正義與發展黨」自 2002 年以後迄今的執政地位屹立不搖，竟創下二次大戰後土耳其實施多黨民主制以來單一政黨最久的連續執政紀錄。換言之，一個標榜伊斯蘭的政黨，在堅持世俗體制的憲政架構下，竟獲得民眾最熱烈的擁護，也建立後凱末爾時代最穩定的政權，甚至有邁向一黨獨大的局面，這是土耳其政治最弔詭之處。是否這是一個邁入二十一世紀的現代穆斯林國家，對百年前國父所建立的世俗體制的徹底揚棄呢？若對照先前世俗政黨執政的不穩定與不得民心的狀況，每十年就要由軍人政變來收拾殘局，今昔的對比令人困惑。但若從上節所述的國內與國際的脈絡因素來理解，穆斯林各國的民眾最終選擇回歸伊斯蘭傳統的政治路線，其實一點都不意外。

土耳其的「正義與發展黨」，比其他穆斯林國家的伊斯蘭政黨幸運得多。1950 年土耳其實施多黨競爭的民主制度以降至 2000 年為止，前後共有四次軍人干政推翻民選文人政府的先例，但慶幸的是，土耳其軍方尚稱節制，在政變之後並未盡行大規模的政治迫害，在恢復政治秩序之後也都能立即還政於民；反之，伊斯蘭政黨也都走體制內路線，並未採取暴力抗爭手段，歷經十年一次的文人政府與軍事政變的四次交替循環，2000 年之後的土耳其逐步邁向民主政治的常軌，成為伊斯蘭世界唯一穩定的世俗民主政權。雖然，凱末爾國父所開啓的世俗主義路線終究不被土耳其民眾所完全接受，但其對土耳其民主共和的堅定信念，為往後的土耳其政治菁英樹立榜樣，無人能以非法暴力手段來破壞民主體制。

與此相對照的另一結果相反的個案，便是埃及的「穆斯林兄弟會」。埃及與土耳其同樣有軍人干政的傳統，過去數十年，無論是採暴力或和平抗爭的路線，埃及軍政府始終以世俗主義立國為理由，剝奪「穆斯林兄弟會」的合法參政權利。2011 年茉莉花革命之後，埃及終於有機會推翻數千年的專制傳統，舉行歷史上首次的民選總統，擁有廣大群眾基礎的「穆斯林兄弟會」推選穆希（Mohamed Morsi, 1951-）參選，果然一舉拿下總統寶座並組成首任的民選文人政府。但執政不到一年，因穆希總統過於急切地要掃除穆巴拉克為首的軍方勢力，反被軍方發動政變而遭罷黜，埃及再度陷入軍方與伊斯蘭勢力暴力對抗的亂局，好不容易建立的民主制度立刻瓦解，埃及回歸軍人專政（Esposito, et al., 2016: 202-36; Teik, et al., 2014: 108-33）。土耳其與埃及的對比，其關鍵因素似乎是掌握國家機器的軍方，是否能夠尊重民主制度，自我克制國家暴力的使用。

根據 2006 年一項由「土耳其經濟與社會研究基金會」(Turkish Economic and Social Studies Foundation, TESEF) 所做的調查，說明了土耳其人的政治認同取向，可為伊斯蘭政黨受到支持獲得側面的佐證。該調查問受訪的土耳其民眾，他以何種認同為第一優先？回答「穆斯林」者為 45%；回答「土耳其共和國公民」為 30%；回答「土耳其民族」為 19%。百年前凱末爾國父及世俗民族主義者期待土耳其人以土耳其民族國家優先，伊斯蘭次之的政治認同，似乎已逐漸被逆轉了。負責該調查的基金會主席 Can Paker 進一

步解釋，目前土耳其人傾向世俗主義者只占三分之一，且這些人頗擔憂土耳其立國以來的世俗主義會被今日的伊斯蘭浪潮所腐蝕，使土耳其步伊朗後塵。認同宗教者則占三分之二，不過土耳其大部分的伊斯蘭信眾較溫和，並接受政教分離的現狀，故只有 10% 支持恢復伊斯蘭律法，其他信眾都仍接受現代價值觀，不認同政教合一。甚至連支持「正義與發展黨」的選民，也只有 14% 支持恢復伊斯蘭律法，反對者高達 70%。1995 年起就曾做過類似調查，當時支持恢復伊斯蘭律法者高達 27%，但該比例反而隨著伊斯蘭政黨聲勢的逐漸上漲，而成反比例的下降趨勢。不過，認為土耳其應該要有宗教政黨者，從 1999 年的 25%，提高到 2006 年的 41% (Rabasa & Larabee, 2008: 23-24)。顯示土耳其民眾對伊斯蘭在公共事務上所扮演的角色有期待，為「正義與發展黨」提供充分的民意基礎，但又不希望走更激進的伊斯蘭立國路線。雖然，對伊斯蘭政黨的存在持相反意見的民眾比例更高，但在先前世俗政府不斷以司法手段來禁止伊斯蘭政黨參政的情況，或許反而使「正義與發展黨」贏得許多民眾的同情，使其邁向執政之路。

艾爾多安掌握「正義與發展黨」取得多數優勢的機會，開始醞釀推動一連串修憲動議，將原本總統為無實權、超黨派的虛位元首，並由國會間接選舉產生，改為擁有實權且由全民直選的國家領袖，並使土耳其從雙首長制變成總統制。2007 年贏得第二次執政權之後，發起憲法修正案公投，通過總統直選；2011 年大選，「正義與發展黨」贏得第三次連續執政權之後，以落實總統制為該黨的主要改革訴求之一，但其他在野黨皆反對，「正義與發展黨」的國會席次尚無法越過修憲門檻，修憲動議只好暫緩。

自二戰結束土耳其實施民主選舉以來，艾爾多安所領導的「正義與發展黨」政權已創下連續執政最長的紀錄。過去數十年來，多黨林立、意識型態南轅北轍，導致土耳其難以維繫長期政治穩定，每十年左右就發生軍事政變來結束亂局，然後再來一次新的治亂循環，「正義與發展黨」在三輪超過十年的執政之後，來自各方的反作用力也開始一一出現。

2013 年，乃是「正義與發展黨」政權開始面對來自黨內、國內的反對勢力挑戰的關鍵年。「正義與發展黨」從在野到執政的過程之中，土耳其各方伊斯蘭勢力一直是最核心的支柱，其中組織與人脈最廣泛、影響最深遠

的伊斯蘭團體為「葛蘭運動」(Gülen movement, *Gülen Hareketi*)，其領導者葛蘭(Fethullah Gülen, 1941-)為具有個人魅力的宗教精神導師⁶。「正義與發展黨」執政之後，「葛蘭運動」大批成員進入政府的文武官僚、司法體系與教育機構，並協助整頓前朝官員積弊與貪瀆枉法情事。但 2013 年的大規模肅貪活動，親葛蘭派的執法人員竟也將艾爾多安的親信與家族成員列為調查對象，導致親艾爾多安派與親葛蘭派之間的嫌隙浮上檯面，埋下艾爾多安未來對「葛蘭運動」大整肅的導火線(Cicekoglu & Turan, 2019: 24-25)。

同年所發生的 Gezi 公園佔領事件，則是極具指標意義的反政府公民運動。Gezi 公園為伊斯坦堡市中心的一片綠地，當市政府宣佈 Gezi 公園將被改建為大型購物中心並開始動工之初，只聚集大約數百名環保人士靜坐抗議並阻擋施工，但市府卻以不成比例的警力強制驅散抗議人士，此舉引發伊斯坦堡市民更加不滿，來自各地的聲援民眾紛紛湧入公園周邊地區加入示威活動，竟演變成「正義與發展黨」執政十年以來最大規模的群眾示威活動，人數最多時高達三百萬人，並蔓延至全國各大城市，示威活動延續長達一個月，不但重挫艾爾多安的民主形象，也拉開朝野雙方新一輪政治角力的序幕。最後，艾爾多安見其勢難擋，終於態度軟化並與抗議民眾代表對話，決議暫緩該開發案。但整個示威抗議的攻防過程，凸顯了「正義與發展黨」雖經過民選的考驗，卻未能採取民主開放的決策過程，仍想直接動用國家機器來遂行其意志，而官方媒體也配合政策噤聲。但畢竟土耳

⁶ 葛蘭出身東安那托利亞的宗教師家庭，年輕時代即加入改革派蘇非道團「努爾庫斯」，因而啓發其宗教靈修結合社會實踐的理念。1958 年，葛蘭開始在遠離家鄉的西部沿海各城市擔任宣教師；1966 年，受宗教事務局任命為伊茲密爾(Izmir)的官派教長，逐漸在周邊區域吸引一群忠實信眾，並組織夏令營，以從事教育與社區服務為職志；1971 年軍事政變之際，葛蘭因參與伊斯蘭改革運動而被牽連入獄七個月，這段經歷促使其發展出低調參與世俗事務以從事社會改革的溫和路線，提倡「蓋學校比蓋清真寺更有功德」的口號；1981 年，葛蘭從官派教長職務退休後，積極與政變之後重組的 Ozal 新政府密切合作，推動教育文化改造，其組織人脈因而更迅速擴張，逐漸發展成為以學校、媒體、商業與專業人士社團所組成的龐大文教事業網絡；1990 年代更朝向國際化發展，形成知名的「葛蘭運動」跨國集團，其組織遍及全球 180 個國家，開辦超過一千所學校，並有媒體與各種文教出版事業組織。參閱「葛蘭運動」官網 Fethullah Gülen's Official Web Site (2021)、以及 Bruce (2019: 27-28)。

其已經跨入了新媒體的時代，佔領抗爭活動的各種訊息，仍透過社群媒體網絡傳遍全國與全球各地，引發來自國內與國際輿論的齊聲撻伐（Keyman & Gumuşçu, 2014: 58-61; Erisen, 2018: 24）。

面對黨內、國內反對勢力挑戰的同時，艾爾多安政權又得應付來自國際社會的更大威脅。2011年，中東與北非各國掀起了追求民主自由的茉莉花革命，歷經兩年之後，情態卻逆轉直下，掌握既得利益的當權派大舉反撲，和平示威的民眾遭到無情的鎮壓，導致體制內改革無望，各地極端勢力取而代之。除了發源國突尼西亞順利達成政權和平轉移之外，埃及、利比亞等改革或革命聲勢較大的國家，朝野雙方以訴諸武力決勝負；改革聲勢較弱的阿拉伯半島各國，當權派則以威脅利誘等手段輕易擺平改革勢力。革命派與當權派最激烈的衝突發生在土耳其的鄰國敘利亞，雙方勢均力敵，且都有國際勢力介入，導致革命不成轉為血腥內戰。土耳其加入西方國家與同屬遜尼派的阿拉伯國家陣營，對抗屬於什葉派支派阿勒維派（Alawi）的阿塞德政權，而後者則有什葉派的老大哥伊朗與俄羅斯撐腰。但更雪上加霜的是，在伊拉克北部攻城掠地的「伊斯蘭國」（Islamic State of Iraq and al-Sham, *Al-Dawlat al-Islamiyat fi al-Iraq wa-sh-Sham*, ISIS），打著拯救受壓迫的遜尼派同胞、建立中東大一統的哈里發國旗號，大舉入侵敘利亞。漫長的內戰導致敘利亞難民大量逃往周邊鄰國，而欲前往歐洲國家尋求庇護的難民，出國的第一站便是土耳其。

2013年，土耳其已公開支持反抗軍，並成為積極介入敘利亞內戰的區域強權，而土耳其東南邊區成為敘利亞難民尋求暫時安頓的最近處所，人數最多時高達兩百萬人，對土耳其的國家安全與社會秩序造成嚴重威脅，因該區域正好是庫德族聚居區，導致「正義與發展黨」政府對如何介入敘利亞內戰陷於兩難。艾爾多安善於將危機轉化為對自身政權鞏固的轉機，遂採取了一石二鳥的策略：一方面透過軍事援助反抗軍一併處理庫德族問題，另一方面以敘利亞難民做為與歐盟談判的籌碼，不時揚言將開放邊界讓大量難民遷徙歐洲。面臨國內與國際問題相互糾結的關鍵時刻，朝野各方勢力更加激烈對抗，艾爾多安的支持者認為國難當頭，應更加擁護艾爾多安這位難得一見的強勢總統，反對者則認為正因艾爾多安的專制與貪

腐，才導致政局紛擾，應該下台謝罪。艾爾多安利用此一危機時刻，大膽採取「庫德族開放」(Kurdish Opening) 政策，直接與主張以武裝鬥爭取庫德族獨立的「庫德工人黨」(Kurdistan Workers' Party, *Partiya Karkerên Kurdistan*, PKK) 領袖對談，藉此緩合庫德族邊區的緊張情勢 (Nimni & Aktoprak, 2018: 137-58; Erisen, 2018: 24-27)。

2014 年，土耳其修憲以後的第一次總統直選，艾爾多安代表「正義與發展黨」角逐總統寶座，或許化危機為轉機的策略奏效，艾爾多安以 52% 的過半數得票率勝過另兩位候選人，無須舉行第二回合選舉，土耳其的新政治強人出線。隔年六月國會大選，「正義與發展黨」打出修憲以落實總統制做為選戰主軸，演變成擁艾爾多安的執政黨與反艾爾多安的在野聯盟選戰攻防。艾爾多安擔任總統以後，引發最大的爭議在於本來土耳其憲法規定總統必須超越黨派，故他在擔任第一任直選總統後便得辭去「正義與發展黨」主席之位，甚至不能擁有黨籍身分。但在國會大選起跑之後，他仍利用總統職位幫「正義與發展黨」候選人助選，引發在野黨抨擊行政不中立，往後對艾爾多安的反撲力道便更加強勁。再加上去年總統大選期間，執政黨擴權作法及選舉期間濫用行政資源的諸多爭議，種下「正義與發展黨」再度無法取得國會過半數席次的敗因，總得票數滑落至 41%，導致無法單獨執政的政治僵局。然則，與「庫德工人黨」的談判此時已宣告破局，庫德族激進份子再度回歸武裝鬥爭路線，艾爾多安趁機再打危機牌，以凝聚己方的支持力道，並指控在野黨暗中支持庫德族恐怖主義活動。11 月舉行第二次國會選舉，「正義與發展黨」再度單獨贏得過半數席次，才終於化解僵局 (Yilmaz, 2018: 33-40)。

2016 年 7 月 15 日午夜的軍事政變，再度給艾爾多安一次以危機來擴權的良機。這場只持續不到一天就落幕的失敗政變，再度喚起土耳其民眾的傷痛記憶，與上次軍事政變相隔二十年，但情勢已大為改觀。艾爾多安親自號召民眾上街以肉身抵擋坦克槍砲以粉碎敵人的陰謀，各地民眾紛紛響應號召，迫使軍人繳械投降；國會議員也形成難得一見的跨朝野短暫合作，一方面共同譴責暴力奪權，另一方面各自動員民眾加入反制政變的遊行示威。隔天政變就戲劇性地落幕，政府運作恢復常軌，安卡拉街頭回歸平靜，

留給土耳其人民與世人諸多疑惑與想像空間。艾爾多安指控這場政變為昔日盟友葛蘭所策劃，以為接下來的大規模整肅遍佈於政府軍公教體系的葛蘭運動支持者鋪路。但自 1999 年已旅居美國而淡出土耳其政壇的葛蘭則斷然否認政變指控，反而宣稱是艾爾多安自導自演此次政變。經過十多年的政權和平轉移，以及在野黨起家的「正義與發展黨」四度執政，土耳其的軍警體系已不再是威權時期可以直接干預政治之協同一體的國家機器，反被擁艾爾多安勢力迅速弭平，並換得接下來對軍公教體系的大規模整肅與換血，如這場政變真是反艾爾多安勢力所為，實為相當失策的一次政治謀略（Cicekoglu & Turan, 2019: 13-35）。

2017 年，在長達將近一整年史無前例的全面性軍公教體系大整肅之後，且在緊急命令尚未解除的狀態，艾爾多安聯合意識型態相近的右翼政黨「民族主義運動黨」，再度發動總統制的修憲公投，順利將政府體制從雙首長制改為總統制，正式廢除總理一職，並將國會議員總數從 550 名增加到 600 名，該次公投再度僅以 51% 的支持度低空飛過，也開啓由右翼兩黨合作的執政模式（Yilmaz, 2018: 43-56）。2018 年修憲後改為總統制的第一次大選，艾爾多安雖和「民族主義運動黨」組成聯合陣線而贏得總統大選，總得票率為 53%，但「正義與發展黨」再度失去國會過半數席次，只剩 295 席，選舉的得票率為 43%，必須與「民族主義運動黨」合作才不至成為跛腳總統，末代總理 Binali Yıldırım（1955-）則改任國會議長。

艾爾多安利用政變之後的整肅異己、頒布緊急命令、監控媒體等獨裁作風，導致新一波的朝野鬥爭逐步醞釀。他雖可穩做總統職位直到 2023 年，但「正義與發展黨」的支持度正在流失。2019 年的地方選舉是一大警訊。在此次全國各省市首長與議會選舉，「正義與發展黨」的總得票數不只和上次國會大選一樣，僅得 43% 的選票，且失去了最具指標性的第一大城伊斯坦堡與首都安卡拉的執政權，這是 25 年來第一次「正義與發展黨」失去兩大城執政權；而全國六大城市的五個皆輸給主要在野黨「共和人民黨」，顯示偏向世俗主義的都市中產階級逐漸回流「共和人民黨」，而艾爾多安強勢的領導風格為其樹立更多政敵。

表 2 統整 2002 年「正義與發展黨」成爲執政黨之後迄今，歷次大選各政黨的國會席次及國會與總統選舉的得票率。此時的土耳其政黨政治呈現準兩黨政治的型態，右派的「正義與發展黨」與中間偏左的「共和人民黨」對決，而另一右派政黨「民族主義運動黨」在總統選舉支持艾爾多安，國會選舉也與「正義與發展黨」結盟；但左派勢力仍由「共和人民黨」主導，而在政治光譜更爲左傾的「人民民主黨」（Peoples' Democratic Party, *Halkların Demokratik Partisi*, HDP），則單獨推出總統候選人，國會選舉也未與「共和人民黨」結盟，左派勢力尚難充份整合。2017 年創立的「善良黨」（Good Party, İYİ Party），爲中間偏右政黨，雖推舉自己的總統候選人，但國會選舉則與「共和人民黨」結盟。此種左、右派的在野黨結盟，是否能挑戰艾爾多安領導的執政聯盟，還待 2023 年大選的考驗。

伍、結論

2011 年伊斯蘭世界掀起了追求民主改革的茉莉花革命，惜因各種內外條件不夠充分，無法推倒現有專制政權的高牆，世人再度質疑伊斯蘭文明是否無法接納民主化的現代潮流？但本文以伊斯蘭世界實施民主政治最久的土耳其做爲研究個案，不但足以翻轉上述質疑，甚且從土耳其累積近七十年的民主經驗，提供吾人更深一層地思考伊斯蘭傳統與現代民主體制結合的可能性與從而衍生之更複雜的各種課題，避免再落入簡化的「伊斯蘭／現代文明」二元對立思維模式。

其實，土耳其也不是唯一建立憲政民主體制的穆斯林國家，但其民主體制之所以較能穩定運作，乃因有其他多數穆斯林國家所缺乏的有利條件，包括：歐亞橋梁的地理位置所衍生之地緣政治優勢、獨特的歷史文化傳統、未曾被西方列強所殖民、單一民族認同的建構等先決條件，以致於其現代化道路是土耳其民族主體意識的選擇，而非外來殖民者所強加，所以也更能採取與本土社經文化條件相適應的改革模式與步調。更進一步而論，民主制度必須立基於全體國民對國家認同具備共識，如第一章所述，

表 2：2002–18 大選各主要政黨席次與得票率

		2002	2007	2011	2014	2015	2018	
					總統	國會 6月 11月	總統	國會
正義與發展黨	席次	363	341	327		258 317		295
	得票率	34%	47%	50%	52%	41% 50%	53%	43%
共和人民黨	席次	178	112	135		132 134		146
	得票率	19%	21%	26%	38%	25% 25%	31%	23%
民族主義運動黨	席次	0	71	53		80 40		49
	得票率	8%	14%	13%		16% 12%		11%
人民民主黨	席次					80 59		67
	得票率					10%	13% 11%	8%
善良黨	席次							43
	得票率							
其他政黨與 獨立候選人	席次	9	26	35		0 0		0
	得票率	39%	18%	11%		5% 3%	1%	1%
總席次		550	550	550		550		600

資料來源：Wikipedia (2021b)。

土耳其民族在從帝制轉型為共和的過程，大致上完成國家共識的建構，雖然仍有世俗派與伊斯蘭派之間的矛盾，但比起土耳其的中東鄰國，國家疆域內存在難以化解的族群、部落、教派、階級等對立，土耳其的國家認同問題更易於處理，後續民主制度的運作也更平穩地步入常軌。

從「土耳其能、其他穆斯林國家不能」的對比，顯示歷史文化因素是民主轉型成功的先決條件。土耳其民族擁抱伊斯蘭傳統超過千年，甚且稱霸伊斯蘭世界長達六個世紀，但在百年前竟毅然決然選擇現代化、世俗化的道路改革國家體制，並大膽採取「脫亞入歐」路線，熱烈擁抱現代西方文明，這一連串的歷史發展已足以證明伊斯蘭宗教與文化皆非不變的常數，而是可以按照民族集體意志的抉擇做調整與變革。然而，此一變革過程能否達成預期的現代轉型目標，又和民族共同體的領導者特質有密切關聯。百年前土耳其共和之父凱末爾率領西化派菁英推動激進的世俗主義共和體制的建構，並以強勢作為排處各種進步的障礙，從後續的歷史進程來看，這是土耳其邁向現代化與民主化相當關鍵的一步。凱末爾等開國菁英所做得不是單純的反傳統主義，而是對原有傳統賦予現代生命，使其更能適應新時代的變遷。雖然，後凱末爾時代的伊斯蘭勢力發動反撲，但這是一個正反合的辯證過程，土耳其發展出相當獨特且與世俗文化、現代價值契合的新伊斯蘭傳統。時至今日，「正義與發展黨」以漸進改革的溫和伊斯蘭路線取得執政權，與土耳其世俗民主體制和平共存，土耳其的民主化經驗證明現代伊斯蘭文明所展現的政教關係光譜極大，吾人不該僅以光譜另一端的「伊斯蘭國」或阿富汗「塔利班」來概括伊斯蘭的政治路線，而忽略了光譜另一端由土耳其所開創的伊斯蘭式民主新模式。

如前所述，凱末爾的激進世俗主義與單一民族認同的建構，留下兩個懸而未決的難題。其一為伊斯蘭的定位問題：伊斯蘭是土耳其國家認同的必要部分嗎？伊斯蘭傳統在現代世俗民主體制所扮演的角色為何？伊斯蘭傳統如何有利於現代化與民主化？其二為庫德族少數民族問題。從 1950 年代土耳其揮別強人政治，邁向憲政常軌之後，上述兩大問題便一直伴隨著民主體制的運作。幸賴繼承凱末爾政治遺產的軍方與政黨領袖皆能尊重民主制度的遊戲規則，在伊斯蘭政黨或其他右派、左派反對勢力挑戰其統治的正當性，除了短期的軍事政變之外，大部分的政治爭議皆能透過政黨政治在體制內的和平競爭與相互協商，世俗政黨與伊斯蘭政黨之間也逐漸建構出雙方皆可接受的妥協方案，激進的伊斯蘭政治從未成為危及土耳其民主制度的難題，足見政治菁英對制度的尊重確是民主轉型不可或缺的要件。

土耳其除了具備前述民族共同的光榮歷史文化傳統、未受殖民主義之遺害、政治菁英對改革的決心與制度的尊重等有利於民主化的因素，其他穆斯林國家所具有的地緣政治所促成不利於民主化的因素，土耳其卻沒有。中東地區位居歐、亞、非三大陸的橋樑位置，自古以來便是兵家必爭之地，現代時期又有石油的經濟富源，始終難以擺脫東、西方強權在此爭奪勢力範圍的困境。但土耳其民族從鄂圖曼時代迄今，因具備足夠的軍事與經濟實力可以自保，並在二次大戰之後加入西方反共陣營，所以土耳其可以左右逢源，適時選擇脫亞入歐或脫歐入亞的對外關係，以謀取國家的最大利益，又不受東、西強權過度干預。但其他中東國家則未如此幸運，長期以來難以擺脫來自東方或西方強權介入或侵略的困局，經常不得不採取選邊站以求自保的策略，但因此曝露於為敵對的強權所懲罰的高風險，其國家的軍事、外交與內政也受制於所依靠的強權，無法真正選擇自己要走的國家發展路線。尤有甚者，部分受制於外國勢力的專制統治者，經常為維護既得利益而鎮壓國內爭取自由民主的反對勢力，而其所依靠的強權也會協助其穩固政權、鎮壓異己，敘利亞就是晚近的著例。所以，將穆斯林國家無法達到民主轉型歸咎於其落後保守的宗教文化，其實是一殘酷而昧於現實的誤解。

土耳其以其歐亞橋樑的地緣政治優勢，無須採取一面倒選邊站的外交政策，故在冷戰時期，乃是在獨立自主的前提下與西方國家維持友善；後冷戰時代，又主動與俄羅斯改善關係，也積極參與伊斯蘭世界的事務，靈活運用脫歐入亞或脫亞入歐的兩種路線，等於享有參與國際社會的好處，卻未蒙強權干預與剝削之害，其民主進程與國家發展路線的調整，大致可以自主選擇，這是受制於美、俄、中等強權的其他中東與中亞國家所無的地緣戰略優勢。雖然，近年來因「正義與發展黨」的伊斯蘭傾向，以及艾爾多安的強勢作風、整肅異己與箝制言論自由，再加上長期未解的庫德族問題，土耳其經常受到歐美國家的譴責，其加入歐盟的協議也暫時中挫，但西方國家大多不會樂見此位居歐亞橋樑的穆斯林區域強權，完全倒向中、俄兩國，所以土耳其仍可在國際社會運用兩手策略，維持獨立自主的國家發展路線。整體而言，土耳其的伊斯蘭政黨透過和平與民主程序取得

執政，其政權並未受到西方國家的抵制，幾乎是伊斯蘭世界的唯一特例。若土耳其的民主政權能夠持續穩固，不但將成為伊斯蘭世界的民主典範，也可能扮演西方世界與伊斯蘭世界化解文明衝突與重建友誼關係的橋樑角色。土耳其已向世人證明伊斯蘭與民主價值不相衝突，建立伊斯蘭式民主與福利國家，而不是一味仿效西方式世俗政治體制或新自由主義的模式，才是徹底擺脫後殖民的陰影，追求真正的民族獨立自主之道。

其實，茉莉花革命的短暫風潮也已證明穆斯林國家的公民社會存在著追求民主、自由與人權的廣泛草根力量，土耳其絕非唯一特例，也不能從相關國家革命失敗的結果，反推其缺乏民主化的條件，只能說這些新興民主改革團體的實力，尚不足以挑戰現有盤根錯節的專制體制，且國際社會對此革命風潮的反應相當冷漠，說得很多，但實質的支援力道卻相當有限。民主化浪潮或許在短期內不會迅速橫掃伊斯蘭世界，畢竟許多穆斯林國家仍未擺脫後殖民社會的經濟依賴，民族獨立所需的基礎建設仍然不足，社會文化結構仍陷於地方格局，大眾與網路媒體的使用仍不夠普遍，而缺乏與外部社會的足夠互動與整合，短命的茉莉花革命說明了大多數穆斯林國家促成民主化的各種內在條件仍然不足。但至少土耳其、伊朗、突尼西亞、印尼等穆斯林國家已透過政權和平轉移先後建立民主制度，透過全球化時代的資訊與人員的無遠弗屆的相互流動，這些民主化轉型成功的範例將會對其他穆斯林國家發揮影響力，一般穆斯林民眾不再認為實行公平、公開的民主政治為天方夜譚、遙不可及之事，也不會認為引進民主制度只是向西方文化投降之舉，伊斯蘭文明也可以建立伊斯蘭式民主，民主化在伊斯蘭世界的未來前景仍可期盼。

參考文獻

- Atabaki, Touraj, and Erik J. Zürcher, eds. 2004. *Men of Order: Authoritarian Modernization under Atatürk and Reza Shah*. London: I.B. Tauris.
- Barthold, W. 1968. *Turkestan: Down to the Mongol Invasion*, trans. by T. Minorsky. Taipei: Southern Materials Center, Inc.
- Bruce, Benjamin. 2019. *Governing Islam Abroad: Turkish and Moroccan Muslims in Western Europe*. Cham, Switzerland: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 Çağaptay, Soner. 2006. *Islam, Secularism, and Nationalism in Modern Turkey: Who Is a Turk?* New York: Routledge.
- Cicekoglu, Feride and Omer Turan, eds. 2019. *The Dubious Case of a Failed Coup: Militarism, Masculinities, and 15 July in Turkey*. Singapore: Springer Singapore.
- Eligür, Banu. 2010. *The Mobilization of Political Islam in Turke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Ercan, Pinar Gözen, ed. 2017. *Turkish Foreign Polic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egality and Global Reach*. Cham, Switzerland: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 Erisen, Cengiz. 2018. *Political Behavior and the Emotional Citizen: Participation and Reaction in Turkey*.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 Esposito, John L. 2005. *Islam: the Straight Path*.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Esposito, John L., Tamara Sonn, and John O. Voll. 2016. *Islam and Democracy after the Arab Spring*.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Fethullah Gülen's Official Web Site. 2021 (<https://fgulen.com/en/>) (2021/3/24)
- Hodgson, Marshall G. S. 1974. *The Venture of Islam*, 3 vol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Hourani, Albert. 1995. *Arabic Thought in the Liberal Age, 1798-1939*.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Jenkins, Gareth. 2008. *Political Islam in Turkey: Running West, Heading East?*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Joshua Project. 2015. "Country: Turkey." (<https://joshuaproject.net/countries/TU>) (2015/12/5)
- Karasipahi, Sena. 2014. *Muslims in Modern Turkey: Kemalism, Modernism and the Revolt of the Islamic Intellectuals*. London: Tauris.

- Keyman, Fuat E and Sebnem Gumüşcu. 2014. *Democracy, Identity and Foreign Policy in Turkey: Hegemony through Transformatio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Kösebalaban, Hasan. 2011. *Turkish Foreign Policy: Islam, Nationalism, and Globalizatio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Landau, Jacob M. 1994. *The Politics of Pan-Islam: 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Mango, Andrew. 2000. *Ataturk: the Biography of the Founder of Modern Turkey*. Woodstock, N.Y.: Overlook Press.
- Nimni, Ephraim and Elcin Aktoprak, eds. 2018. *Democratic Representation in Plurinational States: The Kurds in Turkey*. Cham, Switzerland: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 Noi, Aylin Ünver, ed. 2013. *Islam and Democracy: Perspectives on the Arab Spring*. Newcastle upon Tyne, UK: Cambridge Scholars.
- Rabasa, Angel, and F. Stephen Larabee. 2008. *The Rise of Political Islam in Turkey*. Santa Monica, Calif.: Rand.
- Saleem, Raja M. Ali. 2017. *State, Nationalism, and Islamization: Historical Analysis of Turkey and Pakistan*. Cham: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 Silverstein, Brian. 2011. *Islam and Modernity in Turke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Tapper, Richard, ed. 1991. *Islam in Modern Turkey: Religion, Politics, and Literature in a Secular State*. New York: Tauris.
- Teik, Khoo Boo, Vedi Hadiz, Yoshihiro Nakanishi, eds. 2014. *Between Dissent and Pow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Islamic Politics in the Middle East and Asia*.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 Wikipedia. 2021a. "1950 Turkish general election." (https://en.wikipedia.org/wiki/1950_Turkish_general_election) (2021/3/23)
- Wikipedia. 2021b. "Elections in Turkey." (https://en.wikipedia.org/wiki/Elections_in_Turkey) (2021/3/23)
- Yilmaz, Battal. 2018. *The Presidential System in Turkey: Opportunities and Obstacles*. Cham, Switzerland: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Probe into the Rise of Islamic Political Parties from the Transition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Politics and Religion in Contemporary Turkey

Yuan-Lin Tsai

*Chair, Graduate Institute of Religiou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Abstract

Turkey provides an excellent case to consider the Islamic model of democracy. This article is divided into the following three sections, the first exploring the historical, ethnic and religious contexts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the Kemalist republican revolution; the second focusing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arty politics from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to the 1990s, and specifying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factors to the rise of the pro-Islamic parties; the last examining the political struggle between the Erdoğan-led government and the opposition forces since the pro-Islamic AKP's takeover in 2002. This study aims at explaining how the AKP government maintains majority rule for consecutive five terms after the fifty-year party politics under the radical secularist constitutional system founded by Kemal Atatürk and his followers. In contrast to other Muslim countries, Turkey's relatively stable democratic rule is based up her unique cultural-historical legacy, geopolitical advantage as the Asia-Europe bridge, and longtime independent status without colonial rule. The Turkish people have been capable of deciding their own institution and operating model suitable for their social and cultural conditions.

Keywords: Ottoman, Jasmine Revolution, Mustafa Kemal Atatürk, Republican People's Party (CHP), 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 (AKP), Recep Tayyip Erdoğan

